

寻找路向的日子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四

■ 张五常

1959 到 1965 年那六个年头,我在洛杉矶加大的进境外人看是快的。要不是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我还可以多快两年。阿尔钦几番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像我那样能持久地拼搏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假装拼搏,而今天回顾,我算不上是多么拼搏过。当年我的空闲时间多,喜欢跟一些同学游山玩水,或到深海钓鱼,或在深夜到海滩捕捉小鱼。为了要多赚点零用钱我有时在清早起来派报章,有时在课后替人家剪草,或替老师改试卷,或到学校的停车场收费员——有时右手改试卷左手收费。我也曾经作过鲍特文与布鲁纳的研究助理。1962 年开始我在该校的经济系作助理教员,课余饭后,我喜欢在学生的活动中心玩半个小时的桌球,或桥牌,或乒乓球——事实上,当时我是加大的乒乓球单、双打冠军。我不做的课外活动是参与任何同学会或来自香港的富家子弟的派对。当时在经济学之外的朋友大多是音乐或艺术的爱好者。

翻书多读书少

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认真读过的书及文章很少——加起来不过二千多页。翻书却多,不止几百本吧。翻书是快翻,书名和作者也记不起的。在旁听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的三年中,我喜欢长驻校内的图书馆。当时洛杉矶加大的图书馆没有休息日,每天开放 24 个小时。我在馆内申请到一个仅可在地上睡得下的小房间,内里有桌、椅、书架各一。有电源,可用小发热器煮罐头食品。我有时索性不回家,在那儿熬夜读睡睡。有几位其他学系的同学也这样做。

馆内的书籍当然是分类在架上排列。通道上有手推车,我在架上找寻自己要翻阅的书,放在手推车上载得满满的,带到自己的小房间;翻阅后把书放回通道的推车上,有服务员负责放回书架。图书馆规定学生不可以自行把书放回书架,以免放乱了。

当年翻书翻得快,因为察觉到在同一题材上,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不容易找到几页算是一家之言。这样的重复对我还是有助,因为让我知道作者们的一般取向。偶尔读到有点新意的,就停下来想一阵。

奈特给我的启发(小标)

书本不论,在研究院我读得最认真的文章,是科斯 1960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

——读了两年。当时我也重视奈特(Frank Knight)1924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的谬误》。奈特说的与科斯说的大致相同,只是科斯引进交易费用,而文字也来得比较清晰。我曾多次提到科斯对我的影响,却说奈特,这里说说吧。

奈特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都重要)。其一是在 1924 年的鸿文起笔的第一页,他指出经济理论的假设要与事实相符。这跟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假设不需要是真实”有别。当年从内格尔(Ernest Nagel)1963 的鸿文中我知道假设有好几类,哪类需要是真实呢?反复考虑奈特写得不易读的文章,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大致相符。这使我后来提出一句行内没有谁反对的话:如果在化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试管而假设是清洁的。

奈特给我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他对庇古(A. C. Pigou)提出的两条公路的批评,不仅对,而且含着着租值消散的出现。虽然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出自戈登(H. Scott Gordon)1954 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鸿文,但明显地是源于奈特的公路分析。戈登之作无疑重要,但他的分析是源于奈特——几何图表基本上是搬过去。戈登应该提到奈特,但没有。科斯的《社会成本》是更重要的鸿文,也应该提到奈特,但也沒有。这是一个文字写得根深的天才需要付出的代价。受到奈特与戈登的启发,我后来在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英语文章:1970 年发表《合约结构》与 1974 发表《价管理论》。今天看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1968 年在芝加哥蒙代尔(Robert Mundell)家的酒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奈特,立刻走到他面前,真诚地说:“教授呀,我从您 1924 的文章中学到很多!”他看着我好一阵,感叹地说:“那是很久以前写的了。”我在自己的英语论著中提到奈特不多,很奇怪在《维基百科》写《奈特》那项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家,其中四个获诺奖,最后一个与该奖无缘,那是史提芬·张。他们看得出的英语论著有奈特的影子,是给我很大的荣誉了。

论文题材的范围取舍

在上述的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而把博士笔试押后约两年的日子中,我考虑博士论文要

选什么题材与怎么样写才对。当年美国的经济学博士远比今天的苛求,那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几年颁发一个博士,今天是一年几个。另一方面,虽然我在图书馆翻阅的书一般是抄来抄去,脚注密密麻麻有点无聊,但校方指定博士论文跟硕士的不同,前者一定要是原创。太阳底下没新事,什么才算是原创呢?

我首先淘汰的,是福利经济学那个范围。鲍特文的课教福利经济教得很详尽,其没出息的弊端清楚。赫舒拉发的课教理论清晰,但可取的新理论难求,不容易挤进费雪的行列中。赫师后来希望我尝试把风险引进费雪的利息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那是当时的一个大话题:费雪的利息理论非常精彩,但没有引进风险,是美中的不足。当时尝试填补这个空隙的师级人物不少,包括赫师自己,皆没有重要的收获。赫师认为我是解通这个谜的适当人选。我尝试过两个月,无法肯定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对,放弃了。

余下来的选择,是向验证假说那方面走。这是当时几位老师常有提及的路向,其中最重视的是阿尔钦。另一方面,在验证假说的科学方法上我和几位同学皆耳熟能详。知道怎样做,但没有尝试过,当然跃跃欲试了。验证假说这回事,当时不少老师都在说,可惜我和几位同学见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成绩。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关于币量理论的假说验证时常有讨论,但到处都是争议。说实话,虽然后来弗里德曼和我成为深交,我历来不认为货币理论是那么有趣。当时吸引着我的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非常有趣,但我不能接受该捆绑是为了价格分歧。尽管如此,戴老的思维终于影响了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出自己的佃农理论,那是我转到长滩任教职的 1966 年了。

价格理论的掌握是关键

问阿尔钦博士论文要怎样选题材,怎样写,他说是我的论文,要我自己想办法。但他还是建议我读几篇他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问赫舒拉发,他建议我参考前辈发表过的有大成的博士论文。为此我参考了费雪、萨缪尔森、勒纳(Abba Lerner)与奈特这四位的名成之作。可惜除了奈特,其他三位大师的博士论文皆属纯理论,半点验证假说的操作也没有。奈

特之作无疑是巨著,但他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为不同性质的因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这二者就是上帝也分不开。

作为有创意的博士论文,以验证假说为重心,作者提出的假说当然要有新意。假说的背后是理论。理论当然可以是原创的。当年我否决尝试,因为研读过不少关于经济发展学说的新理论,认为一律胡说八道,令人尴尬。是老师们教得好吧。我当时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仅有相当的水平,而今天回顾那个水平其他大学的老师教不出来。我贯通了阿尔钦、赫舒拉发、鲍特文这三位老师教的。当时没有哪家大学,在价格理论的教导上可以相比。对价格理论的掌握我当时感到舒适,但怎样才可以推出有点新意的理论假说,然后付诸实践作验证呢?找寻可以作理论验证的博士论文题材真的难,非常难,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真的尝试过。能成功地尝试过一次,例如我后来想出写佃农分成,跟着选其他有点新意的验证假说的题材就变得容易了。这是说,一条难走得通的路,走通过一次,跟着再走或选走其他的,仿佛是老马识途。

租金管制与明治维新

当年尝试过的论文题材,最吸引着我的是香港的租金管制。考查之下,发觉数据太多太复杂,不是一个博士生要尝试的。博士后,上世纪 70 年代我在西雅图大兴土木地尝试,终于 1974 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那篇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文章。

另一个尝试过的题材,明显的是个好去处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出现的迅速经济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找到一本古老的厚厚的关于日本经济的历史书,用英文写的,提到从德川时期转到明治,日本的土地使用是把已经有私人使用权利的农地上转让权。关键明确,而我当时正在研究土地产权的问题。但只能找到那一本关于日本从德川转到明治的用英文写而又提到土地转让的书。我拿着该书,约了阿尔钦及赫舒拉发两位老师一起坐下来,问他们研究从德川转到明治的土地使用的转变与经济效果,作为博士论文怎么样。他们一致赞同。但我说自己不懂日文,而图书馆内只有那本英语写成的很旧的书提到日本的土地转让问题。阿老师说可能只有这本书提到日本当时的土地转

让,说不定只一本古书提供的数据足够。

跟着我继续找寻关于日本德川与明治时期的资料,追踪到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位研究日本该时期的经济历史学者,是该校的教授,名为 Henry Rosovsky。我去信约见这位教授。他很宽容,让我到他在伯克利的家的书房中谈了两个小时。该教授说得清楚:某程度的土地转让在明治之前早就出现,只是明治再放宽。他说有关日本土地转让的历史文件与档案很多,但全部是日文,读不懂不能在这题材上作研究。

一年多后,我听到 Rosovsky 转到哈佛的经济系任职,好些年后我听到他是哈佛经济系历来做得最好的主任,也在该校当过校长。怎么会那么巧?我求学时遇到的学者后来多是名家。还记得那天下午在他家的书房中,他问我最喜欢读哪篇经济学文章。我说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他说那是非常深奥的作品。

选题太难转攻摄影

找寻博士论文题材,第一次尝试,真的是难于登天。1964 年的暑期,苦闷之余,我索性离开图书馆,每天独自拿着照相机坐在洛杉矶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重操故技,搞了长达两个月的摄影艺术——老师与同学皆奇怪为什么我失踪了。在那两个月中我想出新的摄法,获得的数十帧作品展示着如梦如幻的光,引来求教的人无数。1965 年这组作品在加大展出,传了开来,老师们多有去看的。后来 1967 年的春天,我把该组作品,加上其他的,再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展出,不少刊物大肆报道,都在谈我的作品上的光。该展出延期了两次,好些参观者从远地来。馆长说他们要建新馆,希望用我的摄影新作作为开馆的主题展出。为此 1967 年的秋天我驾车到美国的东北部,日夕拍摄了两个星期,所获甚丰,可惜跟着到纽约的唐人街吃午餐,餐后发觉车内的物品,包括近百卷还没冲洗的胶卷,全部被偷了。后来再从事摄影,是二十年后在香港朋友的摄影室了。但这是转到灯光人像那方面去——1958 年在多伦多我做过职业摄影师的。

1988 年 10 月,我在该摄影室替弗里德曼摄了他的灯光人像。他很喜爱,说永远不会把另一张他的照片给媒体。今天该作在网上频频出现,当可传世矣!

“经济学家抓大象”笑话的背后

■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我在《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上总喜欢讲一个笑话。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毕业多年的校友,她对我讲的《经济学原理》课的许多内容都不记得了,但印象深刻的就是我讲的这个笑话。笑话是这样的:

目标是要去南非抓一头大象。找了三个人:一个是学数学的,一个是学计算机的,一个是学经济学的。

学数学的人做的第一件事是要证明南非至少存在一头大象。当然,如果南非没有大象,为什么要去抓呢?但这种做法确实体现了搞数学人的严谨性。

学计算机工程的人非常实在,立马就去了南非。他编制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序——从好望角开始,往北走 50 米停下来,画一个半径为 50 米的半圆,抓住这里面的所有四条腿的动物,与他电脑里的大象图做比较,误差在一定

范围之内就把它叫作大象。没有找到的话就继续前行。这就是搞工程的人的实干性。

经济学家用什么办法去抓大象呢?经济学家说,我既不去证明是否存在大象,也不用跑那么远去南非,因为我相信,只要我把价格定得足够高,不用去抓,大象自己就跑到来了。

我觉得这位学生能够记住这个笑话也不错,因为她至少明白了“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当然,这里做出反应的不是人,而是大象,所以才是一个笑话。

经济学原理很多,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原理,这个原理有一定的针对性,也与理解中国经济直接相关。比如,当你想到环保问题的时候,除了技术问题之外,你也要想一想价格在里面起什么作用,这是很重要的思路。

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内容极其丰富。激

励,俗话说就是积极性。当然这种积极性其实只是激励的一种,是正激励。此外还有负激励,就是惩罚,这是人们试图避免的。

人对激励作出反应至少有三种渠道。**第一,人们对价格的反应。**价格上升,愿意多卖东西;价格下降,愿意多买东西。这就是通常的供给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上升,通常的需求曲线随价格上升而下降。基于对价格的激励反应,就有了供给曲线的分析框架。**第二,人们对竞争的反应。**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 Hicks)说过,垄断的最大好处是安逸的生活。而竞争给人压力。在有竞争和没有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或企业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竞争带来的激励。市场经济的一大好处就是竞争,竞争改变人的激励,没有竞争,人就缺少动力做事情。**第三,人们对产权、契约、制度规则作出反应。**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经常强调的非价格因

素,这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非常突显。

经济学研究人的激励问题,与其他学科,比如工程,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在清华经管学院,我们也对工科、理科以及其他文科学生开设经济学第二学位。比如来自环境学院的學生,在学经济学之前,他首先想的是节能减排等工程技术问题。学了经济学之后,他知道环境保护还有人的激励问题,包括价格、产权等。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思路。

可以举几个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稍微复杂点的例子。汽车安全带能减少交通事故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汽车安全带当然减少伤亡,但是未必。因为驾驶员系了安全带,会觉得很安全,所以就有激励开车时更随意一点,事故反而可能增加。所以,这种行为对伤亡的影响比较复杂,对系安全带的人来说确实伤亡会减少,但是如果因此出事故的概率增加了,路上行人的伤

亡可能就会增加。当然,这只是从经济学分析的可能性,现实中驾驶员还是要重视安全带作用,系上安全带后也不能掉以轻心。

类似的,人们还发现,越是制造坚固的汽车,越是容易被发现于十字路口闯红灯。这其实也是容易被激励作出反应。这个道理也体现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金融创新中增加了很多保险工具。这本来看上去很好,增加了保险工具,就应该降低金融风险。但是恰恰相反,人们更加愿意冒险了,因为他们觉得反正买了保险,出了问题保险会赔。

这几个例子稍微绕了一个弯,实际生活中绕的弯可能更多。但道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有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对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到解决和完善的办法。

行为经济学——错误的行为 正确的经济学

■ 宗横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变得主流?”当罗伯特·希勒到访中国时候,一位知名媒体人曾经如此问他。他无奈地笑了笑,“直到我获奖为止”。作为耶鲁大学著名教授与畅销书作家,席勒以“动物精神”、“非理性繁荣”等概念为读者所熟悉,其成就之一就是传统金融领域以外行为经济学概念——他所谓的“获奖”,其实也就是最近两三年的事,他在 2013 年因“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金融学是受行为经济学影响最大领域,以席勒的成就,尚且在主流经济学如此被孤立,可想而知,整个行为经济学在学界状况如何。某种意义上而言,选择行为经济学的学者都有点离经叛道,因为这是一条走的人很少的路,但在这条路上做出成就的人,往往也富有主流经济学不常见的智慧。理查德·泰勒也是其中一员,属于在行为经济学领域正在冉冉升起的名星,著名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就曾评价“泰勒最大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很懒。”泰勒新著《错误的行为》不仅可以看作他个人对于行为经济学求索之路,也可以看做行为经济学如何开枝散叶变得主流的过程,正如他所言,五

十岁以下经济学家都会谈及行为经济学。

他从 1995 年起任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策研究中心主任,他青年时候就赶上行为经济学发轫阶段,得到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等人指导,也是丹尼尔·卡尼曼论文的合作者,罗伯特·席勒也曾引用过他的研究。他的研究聚焦于心理账户、自我控制、公平与金融等。

泰勒对于经济人认知的颠覆与他刚当老师时候一次经历有关。他当时教微观经济学这门课,学生对他不满意,理由是其中考试成绩很低。因为他期待考试对学生考察可以有差异性,分为不同等级,这也意味着他的考卷对于大家来说有点过难,最终他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差异性足够大,然而总分为 100 分的考试,全班的平均分却只有 72。他之所以最初这样设计,也是因为最终的考试成绩是以 A、B、C、D 划分的,考试分数其实不影响大家等级,但是学生对于 72 的平均分很愤怒。作为年轻老师,惹得学生不高兴不是件好事,泰勒希望保住饭碗,于是他做了弥补,他把考试总分从 100 分提高至 137 分。如此一来,如果学生

答对其中 70% 问题,但平均分却能达到 96 分,其实考试难度比上一次略难。但是结果出来后皆大欢喜,虽然学生们知道满分是 137,但是 137 不容易与百分直接这算,看到自己分数接近或超过 100 分,大家欣喜若狂,而不会思考自己在百分制下的成绩。

学生们看过来很羡慕,但经济学家们也没好多少。他去芝加哥大学求职时候,面试完经济学同仁们送他出来,结果在停车场看到地上有 20 美元,他毫不犹豫捡起来,结果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是一场故意的测试。这个场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很反讽:按照芝加哥学派的名言,如果地上有钞票经济学家也不会捡,因为如果是真的,别人一定早就捡起来了而等不到你来捡。这个小插曲看起来最终没有影响泰勒在芝加哥大学求职。

行为经济学的一连串研究对象,很多时候看起来像人类蠢事傻事集合大全,让人大跌眼镜之余,其实也让人重新思考这些看似“错误”的行为背后认知。这些认知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展开。

首先,就人性与经济学的判断而言,人并不

具有经济学理想中的理性,至少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不是,在做关键决策时候也并不是,换言之,人的理性具有有限性,人天生具有非理性倾向,甚至理性往往是感性的随从,即人是理性动物。这并不是对于主流经济学的全然颠覆,而是拓展经济学对于人性的认知,经济人的模型不用被抛弃,但是对人类的认识到其有限性。

其次,上述这点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会改变很多既定思维,不仅是个人生活之中,在管理学以及公共政策中也有很多帮助。行为经济学影响最大领域是金融学,原因就在于金融市场数据的丰富和完善可以迅速检验,对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因为很难检验,所以对于行为经济学接纳有限,而泰勒就期待行为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即使行为经济学目前在宏观经济学影响有限,但是还是可以在宏观政策方面给出给帮助,毕竟经济学家是对公共政策影响最大的学科。很多时候公共政策不仅要有好的动机,有经济学的传统考虑,也应该考虑行为经济学角度的意见。比如泰勒时常提到一个案例,即教师在开学前领到奖金比学期结束领到奖金,对学生的帮助更大,泰勒以往

和政坛人物合作的助推很多思路也与此有关,他曾经与白宫人士卡斯·桑斯坦合作过一本《助推》,建议政府应该用“助推”的手段帮助民众做出最佳决策。

最后,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当下,我们可以对非理性行为以及行为经济学有着更多思考。正如外界所持续鼓噪的那样,这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的非理性其实有了更多价值。人类进化到今天,绝不仅仅是理性的结果,也是非理性的结果,这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往往源自数百万年前的进化遗迹。某种意义上,非理性和理性一起塑造了人类,帮助人类的进化,这其实是人类智能的突出之处。对比之下,人工智能的进步往往体现在确定规则之下的博弈,比如战胜围棋高手李世石的阿尔法狗之类,那么未来来看,人类优势可能是在不确定情况之下的博弈,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的动物性其实是在保护人类。更进一步,越是计算的时代,那么对于各种非理性行为以及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就更值得挖掘,在一个人脑遭遇机器超越的时代,这或许会成为科技飞跃与人类自救的最后一张船票。